

【综述】

“传承与创新:江南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晓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4)

2014年12月6日,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传承与创新:江南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近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论文的内容包括了江南地区的历史发展、江南史研究状况总结以及最新的一些文献整理成果发布,涉及了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间组织等各个层面。本次研讨会就古代江南、近代江南文献资料问题、近代江南城市生活、明清与近代江南社会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1. 江南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开幕式上,上海社科院王战院长指出江南的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他本人也曾经长期深入思考江南史的发展脉络,以为江南史研究应该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而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所谓海派、京派文化的说法。同时,在江南史的研究中更应该注意重视江南史和上海史的关系,江南史既是上海史的过去,也是上海史的未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的形、发展乃至今天的兴起,其实便是江南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必然结果。因此江南史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在此基础上做了阐发,对于江南史和上海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对与会学者的热情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江南”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长江中下游是大江南地域范围,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中江南,太湖平原一带是小江南,在院领导的支持关怀下,历史研究所不久即将成立江南史研究中心,以长三角地区为重点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更多地开展各方面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一同为江南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力行教授发表了关于如何从社会文化史视野的角度研究评弹和江南社会的学术观点。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利用日本筑波大学收藏的旧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晚清民国浙江地区的一批富有史料价值的田宅交易文书,对明清民间房地产买卖进行了新的深入阐释。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对于江南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即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做了阐述,强调深入挖掘和整理新资料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总结了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指出了搜集和整理新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的编纂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则对近代开埠后上海近郊农副业部门的演进做了梳理。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则剖析了过去学术研究中有关上古时期“古代江南落后”的普遍知识景观,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进行了跨学科的解读,指出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江南没有像中原那样进行类似的文明创造。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夏维中教授的论文探讨了明代中期江南农村基层组织因官田的赋役压力而进行调整,指出许多举措开创了改革的先河。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庆柏和郭超颖的论文对于江苏近现代社会救济与慈善文献作了整理研究报告,对其重要价值进行了述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正研究员马军研讨了南浔顾家、常州盛家等老上海豪门和百乐门大饭店的关系,以此从一个侧面展开对老上海社会的观察。

2. 就明清以前的江南历史文化问题进行了梳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爱梅在其报告中通过以春秋时期吴国的“夷夏之辨”来论述吴国如何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体系进行文化认同,以及这种认同活动与争霸活动的关系,指出如何理解吴国发生的“夷夏之辨”反映的历史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剑光的论文指出当时商业兴盛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生

活服务业依托了城市发展而兴起,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由于六朝和南唐的中央政府在江南,因而城市手工业中官营的那部分所占份量较重,外贸业也很发达,产业结构基本合理,产业地域性明显,城市产业分工与城市发展相适应。上海博物馆的陈凌从出土文物提供的新信息来对上海地区道教信仰作了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潇鹤提交的论文是对东晋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资料进行考证,补充了粟特人研究名家荣新江已有的研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张晓东则对隋唐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和地区分布从隋唐东征军事活动对工业生产的刺激这一角度作了研究考察,指出在战争动员的推动下,江南地区造船业的潜力得到发挥,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陈磊的研究报告对于隋唐时期江淮地区的瘟疫与社会进行了研究,统计了隋唐文艺发生的相关记载,探究了发生原因,考述了当时医书中与实践中的应对之道,以及“疫鬼”精神信仰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纯艳提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宋代长江航运空前繁荣,从航行方式中航行、港口等不同角度对于宋代长江船只的技术和结构以及航行中不同群体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指出当时已经存在一个有相对独立特点的行业群体社会和相对独立的市场。安徽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康武刚的论文讨论了宋代温州滨海平原水利开发的经费筹措问题,考证了水利工程的地理条件、官方财政支出以及民间水利集资等问题。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段炼的报告梳理了古代上海地区养鹤习俗及其影响。

3. 对江南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与会者为理解江南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第二会场的学者的讨论是以文献资料为主要考察对象,主持者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振忠教授,点评人是江庆柏、吴建华两位专家。

复旦大学历史系巴兆祥教授的论文研究了商务印书馆对近代方志编纂出版事业的推动关系,重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在方志收集、整理出版等方面的业绩,并以此阐述其对近代方志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统计了相关方志类图书的整理出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叶舟论述了近代苏南族谱的改良,包括修谱观念、修谱组织和家谱编纂形式的改良等问题,由此对传统宗族在近代的自我调整提出新的认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池桢的报告提出了对江南史原始史料进行选编外(英)译的有关设想。南京大学历史系罗晓翔关注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南京士绅家族的逃亡经历及其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对逃难路线、谋生活动、士人心态等问题都作了考证。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陈谊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求恕斋日记》中所涉南浔刘氏家族的文化活动史料,进行钩稽,从藏书、编书、祭祀等诸方面展示江南传统家族的各种文化活动,并尝试探寻此类文化活动背后的社会思想基础,为江南家族史研究提供案例。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金晓东提交的报告考述了邵懿辰与蒋光燾交游及其文化活动,考述了其存世文献、结交、藏书交游、刻书交游、护书交游等问题。苏州博物馆的李军考证了松下清斋陆氏的事迹,包括陆氏的现存艺术藏品状况。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秦蓁则从《赖古堂印人传》出发考证了明清的印人世家。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考释了一封文人陈祺寿旧书信,独立学者印晓峰则考释了淮军名将吴长庆致刘秉璋的军中信函,介绍了曾国藩的湖口大战手书佚令。

4. 以近代江南的城市生活历史为主题,与会者的阐述呈现了不同的城市生活形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志茗的论文梳理了上海公共租界治理的制度变迁,强调近代公共租界当局从西方引进的一套的城市治理制度的引进、落实、完善,并就历史事物的特征对现实提出了借鉴和启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江文君的论文指出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与江南传统的关系导致了“等级秩序”和“阶级格局”之间“新旧共栖”的格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志阳指出近代江浙丝商对上海慈善事业的重要影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洪煜、刘永广的论文以无锡1929年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中心研究了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指出背后存在政府、绅商、市民各自之间复杂的观念与利益冲突,无锡报界则利用报刊媒体将城市建设工程问题型塑为革命行为象征符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怡论述了1935年苏区的保学在婺源推行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发掘出当时的教育弊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申浩梳理了晚清江南从苏州到上海的男女弹词的流变及其社会变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岳钦韬论证了晚清区域铁路布置与江浙路权风潮的关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副研究员沈洁讨论了围绕20世纪初年江南地区“禁革迎神赛会”进行的政治建构与国家治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张剑对近代无锡高分子化学家于同隐做了传述,考证了其人生道路与学术成长过程,认为从家庭出生与社会关系角度看乡土因素和师承氛围都是重要的正面因素。

苏州大学历史系的吴建华总结了明代苏州的地位。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的论文研讨了清代江南命案

尸场勘验的制度规范与法律表达,其中的弊端和长期的改革整顿,以及整顿后官府的新举措和新要求。李甜研讨了明清以来旌德与徽州的地域关系,指出旌德有对徽州的向心认同,即使在1987年当地自徽州地区改属宣城地区之后,当地人的徽州地域认同也没有得到相应扭转。复旦大学史地中心的朱海滨教授研究了明代浙江杭州城隍神周新的信仰形成过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健研讨了十五世纪末期江南毁淫词的问题,是对其个人同主题研究的深化和补论,对影响运动形成的各种因素做了论述。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学者龙飞俊的报告根据近年上海浦东乡村道士田野调查的情况,对“火居道士”进行了研究,指出在浦东乡村社会中道士以“家族”形式存续,且与地方社会发生一定联系,形成了浦东乡村道教“道士家族”与“法脉传承”并存的面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李家涛从相关典章的解读入手探讨了清代江南地区水驿制度,分析了制度建构的相关要素。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龚浩以江苏省为中心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朝廷误认为地方财政因为“官侵”而亏空,因此整顿吏治,搞养廉银改革,但由于“官侵”并非亏空的主要原因,改革终于失败。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薛理禹对明代嘉靖年间的保甲法实施进行了研究,指出其保甲法实施具有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机制日趋完善,各地实施方式的自主性,应时性与反复性强等特点。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赵思渊通过徐兆玮日记与书信深入发掘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冲击江南士绅利用新学表述自身责任与身份意识,并以此参与和影响政治进程。

(责任编辑:蒋萍)

全国儒佛道治理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顾海建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优秀创新团队、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办的“全国儒佛道治理思想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5—18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了儒家、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下是会议探讨的主要议题。

一、宏观视野下儒、佛、道的治理思想的对话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大量的关于社会治理思想资源有待于当代学者开掘,以资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深入讨论。

王杰教授(中央党校)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和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经由个人身心和谐到家庭和谐,再到国家和谐,最后到天下和谐这样四个环节次第实现,他强调四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而其中的精髓便是和谐,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对当代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魏义霞教授(黑龙江大学)从仁爱兼爱比较儒墨两家的治世思想,认为“爱”是儒墨两家思想的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而此伦理原则的最终根据是“天”。但儒墨两家在治世的初衷和方法上一是仁爱、一是兼爱有着不同的思想旨趣和理论特色,使得二者在最终的历史命运上呈现一盛一衰,以凸显儒家治理思想优越性。

罗安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治国理念层面上比较了以道治国与以德治国,认为儒家以德治国,其根本是以道德来教化民众,具体而言是“仁”思想的外化为当政者爱民且以身作则;而道家以道治国,则是“道法自然”理念形而下化、具体化。通过比较他认为儒家以德治国是一种好的治理理念,而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最根本的治理。周可真教授(苏州大学)着重探讨老子的公平思想。他将老子的公平思想与孔子公平思想的区别为:老子是以“自然”为正义原则、“道”为正义准则,孔子是以“仁”为正义原则、“礼”为正义标准。周教授认为关于社会理想目标的价值依据“道”是优先于“仁”,也因此可以说道家的治理理念是优于儒家的治理理念的。老子依据“自然”的原则所要创建的公平社会是以“温饱型共同富裕”为特征的“自均”社会,它必须依赖于“法自然”的“圣人”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何善蒙先生(浙江大学)通过检索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认为

“道”是道家治理的思想的形上根据或理论基础。何先生还进一步讨论了《老子》中“大国”的观念以及“小国寡民”在《老子》文本中的价值定位问题,认为不管大国还是小国,其治理上都应当是以道治国,但“大国”在治理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价值优先地位;“小国寡民”也并非《老子》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描述,而是借“小国寡民”都可以实现返回到古代理想政治的状态来衬托实现的“大国”理想政治的可行性、易简性,当然实现的政治原则就是“以道治国”。

董群教授(东南大学)认为佛教治理思想非常丰富,他从觉者的治理、以戒为师、中道式治理三个层次分别回答了社会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内在德性要求,治理公共行为的规则和对治理对象的伦理要求以及治理的方法论原则。而陈坚先生(山东大学)则认为现代佛教是一种开放性的宗教组织。它作为当代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接受相应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佛教也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合适的宗教以外的或非宗教的服务,并且有限度地参与社会管理活动,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二、微观视阈下儒家治理思想多维探讨

儒家治理思想是传统政治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次会议提交论文中讨论最多的部分,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儒家治理思想理念与践行、过去与未来。

1. 儒学经典中治理思想价值的多面彰显。李振纲教授(河北大学)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认为儒家人道理想教化的实质是强调道德理性的自觉。道德理性自觉指的是对善的内在性的觉解。有了这种觉解,道德才能超越一切现实功利性,成为生命实践的绝对命令。孔子的人道思想落实到政治上,形成一套以“德治”为核心的“治道”思想。胡治洪先生(武汉大学)通过对《孟子》暨孟子引述《尚书》的文献的爬梳与厘定,认为孟子引《书》的用意在于期望政治领袖要修养仁德才可能实现德性政治理想社会的目标,而这一德性政治思想一直也为孟子以后儒家所秉承,并在实际政治生态中发挥了一定的范导作用。最后认为德性政治为后世人类政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警戒,即一切政治都必须具有道德内涵,才能向良善的社会发展。

东方朔教授(复旦大学)在儒家民本主义视阈下着重讨论孔孟荀养民与教民的次序问题,认为养民和教民的关系从政治施政措施而言其间先后轻重或只具有相对意义;但是从思想系统的逻辑上反省其根源性问题,则所谓养民教民之先后轻重的判断,必须在理论上寻求其所以如此判断的原则,并保持其统一性和一贯性。由于孔孟的观点和荀子政治学说的原点有区别,所以孔孟这里教民要重于或先于养民,而在荀子那里,则养民要重于或先于教民。胡发贵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着重探讨了孟子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民生观念。他提出孟子国家治理思想中“民生”是头等大事,只有完成“制民恒产”的物质基础建设,才会有在此前提下提出“与民同乐”即民生共享的社会公平理念;进一步提出善养“四穷民”理想的仁政社会。

杨海文教授(中山大学)以《荀子·议兵》篇为例,论述了孟子、荀子在关于“汤武放伐”这个大事件上所持的观点的相似性,即都认为“汤武放伐”是仁义之师的仁义之举。另外在王道与霸道价值定位问题上,杨教授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孟子、荀子都主张王道高于霸道的价值定位,孟子不是传统意义上反对霸道而是认为霸道之中注入仁义也是政治治理的次优选择,荀子亦不是肯定霸道反对王道而是认为霸道也是次优治理方式之一。孟荀的理论主张在汉代以后演变为王霸并用、儒表法里的国家——社会治理方式这不能不说是孟荀王霸之辩自身的理论生命力的彰显。王军(江苏科技大学)以孟子为对象考察,认为孟子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极大地发展了“内圣”之学,也因此以往的研究过多地关注孟子人性论的道德意义;但孟子的内圣并不是不要外王,而是通过内圣而实现外王。孟子的思路是:通过对人心、人性的考察而安顿人——心(内心)的秩序,再将此秩序外化为人——人秩序。这一过程中,孟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心秩序观。崔海东博士(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检视论语中的治理社群的原理和制度,认为《论语》中孔子论政有变态(春秋)、正常(西周)、理想(唐虞)三种政体,则其治理主张亦因此有两层发展:一是批判变态政体、回归正常政体;二是超越周制、迈进理想政体。

2. 儒家治理思想的在传统社会的践行。儒家治世思想在传统社会践行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总体来讲取得了不错的实施效果,但也有不足之处。这次会议学者们也从不同的侧面对治理思想在传统社会的实施给予了讨论。

李承贵教授(南京大学)以杨简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治世思想,认为杨简的“治世”思想表现为“心政”。“心政”源自于本善之心,外推为:治灾以治人心为先、治民以治君心为要、治政合乎天下之公心。此“心政”进而由“克艰”、“知恤”、“敬信”等向度展开,并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治政实践。杨简的“心政”在造福于民的实践中

形成了一种儒家心学孕育的政治景观,其理论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可资当世借鉴。陶新宏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以南宋儒者程世昌为个案来研究其治理思想,通过对传世的相关文献梳理和比较,系统呈现了程氏的社会治理的内在理路,即“主修身,倡仁政”的治国之基及“循理以行、不自作为”的治国之策。同时凸显程氏在此治理思想基础上能够结合历史和现实将理论落实到实践的能力和风范。

余治平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乡规民约入手来考察儒家治理思想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他发现《南赣乡约》和《吕氏乡约》,虽有民众自发组织的自治与政府督促的官治的分别,但是二者都具有乡约的劝导、规范和进德的特点以使儒家的教化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配以基层社会组织“保甲”、“社仓”、“社学”等形成一套完整的乡村治理系统,对底层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巩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赵平略教授(贵阳学院)对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进行了一番仔细检讨,认为《南赣乡约》不仅为基层社会各个层次的人员制定了道德和行为规范,对基层社会的弊病开出了诊疗方法,而且设计了一个合理且易行的基层社会自治程序,这是一套相对完整乡村治理体系;但是他同时指出《南赣乡约》在设计上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基层领袖和精英的监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朝消极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就受到了极大挤压,这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3. 传统儒家治理思想价值的现代转化。传统儒家治理思想有诸多层面,要使其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价值,就应该进行现代诠释从而实现价值的现代转化。

谢晓东副教授(厦门大学)基于对王道政治的仔细的分析认为儒家必须走出王道,开掘孟子“仁义内在”、“求在我者也”的思想中自律(自主性原则)来沟通康德哲学意义上自律观念。康德将自律观念贯通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因此自律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就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因此认为自律观念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拱心石、理论原点或阿基米德点,它可以在牟宗山“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路之外以“康德为典范”开辟一条通往民主政治的新路。

陈继红教授(河海大学)从道德哲学视阈中看到儒家“仁”德是对治现代社会道德冷漠的良方。她认为儒家的仁者爱人确证了己对他者的责任,并基于道德主体间关系指明了此种责任与自我实现的一体关联性,由此激发“旁观者”的责任自觉;为仁由己喻示了“以德性指引规则”律令,引导人们重新返回到人本身去思考行为之目的,由此而克服“以规则取代良知”道德冷漠现象。“三达德”之德性构成昭示了人己两利的实现之途,引导人们在承担他者责任的同时充分尊重己之合理的外部利益的需求,由此而消解抑制主体施救于人之意愿的致因。

刘梁剑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孔子的“正名说”切入来探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认为儒家正名主义的语言哲学意蕴在于:语言与实在相互编织相互渗透,因此语言可以作用于实在;这一点在政治之域表现为,语言对于政治文化秩序具有建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名言”借助现代话语载体的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魔力,现代意义“正名活动”亦自然成为首要的政治活动。朱承副教授(上海大学)通过对《礼记》饮食之道的考察,认为饮食之道中体现的权力以及等级秩序,反映了儒家的生活政治,即将政治价值和等级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又通过日常生活来巩固和保障政治权力所必须的价值和秩序。他提出现代社会我们如果要落实“生活政治”范式的积极意义,就必须在其中注入现代性的价值和原则并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会议闭幕式上李承贵教授作总结,认为本次儒释道治理思想研究为主题,与会学者讨论的问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对传统治理资源梳理和开新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尤其是对儒家治理思想的梳理和开新提供不少有益的内容。但仍然希望进一步挖掘治理思想资源的研究空间,让传统治理思想研究的视野由集中于治理社会向治理人心、治理自然方向拓展,并让这些研究成果真正落实到我们当代社会治理中,这才是学人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蒋萍)

更正

本刊2014年第6期第101页所刊发的《一百二十回完整性新论》一文的作者“陈思和”更正为“刘民红”,谨在此向陈思和先生诚致歉意。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15年1月20日